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九十五期
2021年05月　　頁77~109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105_(95).03

# 冷戰早期的文學與政治：重訪夏濟安的魯迅論*

朱　遠　思**

## 摘　要

凡治海外魯迅學或現代中國文學學術史者，無法繞過冷戰早期夏濟安（1916-1965）的魯迅專論。但早逝令其著述長年處在冷戰政治文化的立場陰雲中，奧義始終不得昭彰。有幸《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47-1965）》為此提供了豐富的一手資料。通過對夏濟安生平中某些關鍵經驗的歷史還原，本文打算就其魯迅論在兩個相關層面上提供新的解釋：一是通過重新解讀他五六十年代大量的政治、文化評論，指出夏濟安在批評魯迅的同時，還積極介入戰後政治文化的文學—政治論辯，不斷強化個人與其所處時代的緊張感；二是還原其魯迅論如何通過這種論辯最終反映新古典主義的文化旨趣，同時令魯迅文學取得文論史意義，突顯了自身強韌激進的文學性，從而為現代中國文論增添一可能的向度。

關鍵詞：夏濟安　冷戰早期　新批評　魯迅論　現代中國文論

2020.04.20 收稿，2020.08.29 通過刊登。
* 承蒙學報編輯部支持，所有匿名審稿專家惠賜意見。在筆者無法依靠任何正式的指導，又是新手的窘境下，他們的付出令文稿臻於完善，謹此敬申謝忱。
** 杭州師範大學文化創意學院學士生。Email: vladimirzhu1998@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一、背景：
# 冷戰早期政治文化中的夏濟安

在世界文學的尺度下觀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話語和政治論述的糾葛可以說在冷戰早期（1950s-1960s）到達頂峰。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還是臺灣的「戒嚴」，抑或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清洗，政治立場對文學觀念所表達的侵犯同時又是全球性的：自主地創作、研究文學（乃至廣義的人文學）已成妄想，人人需先寄生於某一意識形態及其背後的機構（institution），方能得以立足，好像冷戰早期的文思學想不以意識形態兩極化的背景為準繩便全無探討的價值。這種看法很明顯受到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影響：文學出自意識形態的建構，而意識形態是一套有其具體的實踐和機構的物質體系。冷戰早期全球的文化政治形勢表面上可謂為此高論提供了一個完美契合的現實情境，數十年來令不少有識之士沉浸其中，不惜落入重複闡釋的境地。

但二十世紀的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同時又處在一個前所未有反復強調所謂文學性（literariness）的時代，包括中國在內，文論家以自覺的衝動客觀發掘和堅持文學作品中的純粹質素，突顯「純文學」的參與與表達意識由來已久：中國早在晚清文論家王國維（1877-1927）引介德國古典美學的時代發軔。其實冷戰早期的中國也不例外——遺憾的是，對冷戰早期文學話語與政治論述關係的刻畫，仍停留在被政治文化的烏雲所籠罩的局面，且大體仍將持續。像活躍於彼時的夏濟安（1916-1965）就是一個非常值得言說的樣本。

夏濟安常被標記為英美文藝理論脈絡下新批評（New Criticism）或人文主義傳統在中國的傳人，[1]不容於當時「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主流話語。時過境遷，參與美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項目的學術履歷和反共的政治立場，使得他關於現代中國文學，尤其是針對彼時已被中共「封聖」的作家魯迅（1881-1936）的祛魅式批評背後歷史語境的隱晦繁複常被低估：凡治海外魯迅學、現代中國文學學術史者，無法繞過冷戰時期夏濟安的魯迅專論，

1 「夏先生這一看似任意、輕鬆的定義，讓我聯想到的，是夏濟安、夏志清兩兄弟在世俗實踐層面上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形象。」宋明煒，〈夏氏兄弟與人文主義〉，《新民週刊》第 45 期（2005 年 11 月 11 日），頁 70-71。與夏氏兄弟關係密切的李歐梵教授也有同樣的說法，見：李歐梵，〈光明與黑暗之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當代作家評論》2007 年第 2 期，頁 10-19。作為對夏氏二人最為流行的評價，「人文主義者」說至今仍被反復徵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他對魯迅所抱的「同情之瞭解」令人印象深刻——可他究竟是怎麼做到的，目前仍缺乏生成史維度的答案。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47-1965）》（以下稱《書信集》）完整公諸於世，為後人進一步瞭解他與魯迅的思想關聯提供了豐富的一手資料。有大量、清楚的細節表明，夏濟安與魯迅的關係絕不止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那麼直接單純。由於動搖了魯迅文學史上一貫的「神聖」地位，夏濟安祛魅式的魯迅批評當最引人注目。身兼文學作者和政治人物兩重身分，因而極具話題性和代表性，兩方面影響力最能貫穿「現代」和「當代」的現代中文作家，首推魯迅。對於夏濟安而言，作為批評對象的魯迅獨具文化政治方面的典型意義：被兩岸神化／醜化的作家魯迅形象，一種被高度政治化的魯迅文學，[2]如何在冷戰早期——又一輪「中國」與「世界」的激烈衝突，不同意識形態的嚴陣對壘當中，被遊走於中、英文語境的夏濟安質疑、祛魅和延展，想必最為考驗他對新批評的創新性改造程度，對魯迅作品裏文學創作和政治實踐關係的思辨力，對中國現代文化政治傳統的眼力，進而左右他在現代文論史中的位置。以往的討論常忽略，在夏濟安這批信件中，魯迅的名字不少見，相較於他為了完成任務而涉獵過的其他左翼作家，可謂意義不凡：1965 年離世前，夏濟安頻繁給胞弟夏志清（1921-2013）寫信吐露心聲，於字裏行間留下大量針對中國現代文人與作品的評騭，其中便費了不少筆墨談論魯迅；與夏志清的直截批判不同，他對魯迅其人其文可謂饒有興致。更重要的是，魯迅獨特的精神氣質還直接影響到夏濟安的文學—政治思想在冷戰早期的形成。

王德威教授近來指出，夏氏昆仲所秉持的新批評精神，不僅強調細讀文本，審美判斷也延伸到政治思想和情感語境，包括道德判斷和政治判斷。[3]眾所周知，新批評派比當時其他文學研究流派都更加重視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的訓練，得益於此，夏濟安正好可用更細膩的眼光分析、研究文本以外，政治、文化局勢中涉事者的細節。這種延伸有意提醒，受冷戰時期政治文化的強勢擾動，不可無視夏濟安的新批評與文本外部世界的劇烈變動的有機聯繫，畢竟審美觀念的落實某種程度有賴於後者帶來的啟發，性質上不僅遠不止於針對具體作家的批評，亦有別於傳統的只退守文本本體論的新批評。下文將會揭示，夏濟安如

2 關於兩岸對魯迅的神化／醜化，參見古大勇，〈臺灣「戒嚴」時期和大陸「毛澤東時代」兩岸的「魯迅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 年第 11 期，頁 93-104。

3 王德威，〈五四之後：有聲的香港〉（2019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香港科技大學「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文字稿由網友整理，發表於「豆瓣」，〈https://www.douban.com/people/124764727/status/2493493268/〉，2019 年 5 月 11 日上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通過啟動文學與政治的激烈辯論，藉魯迅文學明確「士大夫」用「傳統」（皆屬夏氏術語）對抗政治禁制、回應時代命題的意義，在日常政治化語境中思索文學面向傳統時究竟可以有何作為，這些努力也順勢內化為現代中國文論的一部分。

有關中國「文論」（literary thought）的研究目前方興未艾，出於從歷史流動性的角度探究文學價值浮沈的立場，筆者擬採用王德威教授在〈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中認同的說法：「一些屬於不同體裁的具有豐富多樣性的文本」，來「解釋文學在文明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描述文學和文學作品在思想和社會生活領域引起的迴響」——相較於純粹「理論（theory）為體，批評（criticism）為用」的文學研究體制，以中西彙集、古今交雜為主要特點的現代中國文論的建構，除了正視西學體制在現代中國獨特的接受脈絡，力求擺脫生搬硬套的學術惰性，澄清西方文學理論在引入中國語境後觸發的原有中國古典文論、西方文論兩方面的質變，以及文論家詮釋文學的創造力外，亦包括文化政治意義的不得已：對理論的援引動機動輒得咎，表明政治的冷戰興許只異化為文學論述無休止的立場糾葛而已。[4]這意味著我們處理現代中國文論時，不僅不該被既定的西方學制所囿，回避、粉飾其中文學和政治的曖昧，反而要主動追蹤、辨析其中的運作和變異。

通過對夏濟安生平某些關鍵經驗的歷史還原，本文打算對其魯迅論在兩個相關層面上提供新的解釋：其一，考慮到夏氏文本當中文學性與政治性互搏的語境，首先需要將他五六十年代大量篇幅的政治、文化評論和其魯迅專論統合觀察，進一步揭櫫夏氏批評魯迅的真實意圖——此說借鏡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版本的脈絡主義思想，有意關注夏濟安一眾批評文本的行動維度——指出夏濟安在批評魯迅的同時，實際還積極介入戰後臺灣政治文化的文學—政治論辯，[5]強化了他個人與他所處時代的緊張感，因此他的魯迅專論還是「言志」之作，斷不能同美國的中國學界中的其它魯迅研究混為一談；其二，尋求將學術思想史、生活史、政治史和文學史等不同取徑加以整合的可能，嘗試從批評視野、知識資源和人際關係三大相關層次論證，其魯迅論如何通過這種論辯反映出一種新古典主義的文化旨趣，並從一個更為寬闊的視野中突顯自身強韌激進的文學性，從而為現代中國文論增添一可能的向度，故存「載道」之志。

4 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5 期（2017 年 7 月），頁 290-291。

5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賞一卿譯，〈談文本的解釋〉，《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圖」(intention)這個概念當然與新批評的「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衝突。不過筆者想要揭示的，恰是這樣一種深藏於歷史的矛盾和反諷，令人心馳神往的創造力往往從中不斷湧現。為了讓讀者體悟到其中的全新性，必須指出，夏濟安從來沒打算要彌合實證主義和形式主義之間的分歧：他的文學思想固然重視起了社會因素，卻與馬克思主義文論毫無瓜葛，倒更像新批評因歷史機緣而產生的一種「社會化」突變，即在不過分糾結研究路徑的前提下，逐漸意識到可以把個人及其所處的整個環境當作文本來細讀。

## 二、與魯迅的跨時空對話：從新批評走向新古典主義

### （一）冷戰研究的視點轉移：從國家體制到個體生命

有別於胞弟夏志清的順風順水，夏濟安輾轉於中國大陸（1916-1949）、港臺（1949-1958）以及美國西海岸（1959-1965）四地的人生後半程可謂漂泊無定。然而作為一個有感於世變的知識人，去路之曲折，經歷之動盪也促使他不斷反思中國文學和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起伏運命。在這樣的背景下，向來無感於現代中國文學的他，竟著手研究當時仍被認為是左翼作家的「民族魂」魯迅：〈魯迅與左聯的解散〉（1959）和〈魯迅作品的黑暗面〉（1964）主要針對魯迅與自身、集體的關係展開論述。唐小兵教授指出，夏濟安的左翼文學研究勝在「對左翼文學優劣之洞察、對人性在歷史與政治困境中的掙扎之深度理解，以及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內在悲劇感的通透把握」。[6]但這些褒獎一旦與夏濟安的自道相比照，卻難免引人困惑：

> 我與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運動都毫無聯繫……我做的研究是傳記性的和歷史性的，並不是自傳性的。所有材料都是調查所得，亦即在圖書館閱讀所得。全書全無個人經驗，除了我自己的觀察和評價。[7]

在材料匱乏、全無親身經歷的窘境下，興許心理學分析和介入式的批評方法會

6 唐小兵，〈左翼知識人與中國革命——評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二十一世紀》第 164 期（2017 年 12 月），頁 141-142。

7 夏濟安著，陶磊譯，〈一部關於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書稿序言〉，《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 xxxi。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為他提供進入作家內心世界的便利，[8]傳記性寫法和陳世驤（1912-1971）所謂「同情的批評」對魯迅「黑暗面」的發掘也展現了文論家上乘的美學素養。但倘若缺少生成史背景的活化，夏濟安對相關知識資源的創造性運用將不能徹底為讀者所理解：如對時代巨變深切的生命體驗，對中國現代知識人和現代中國文學由來已久的現實關懷，以及關懷與審美判斷的頻頻互動；不足以回答他何以憑區區兩篇論文就足以突破冷戰學術的建制性桎梏，於域外魯迅學學術史留下重要一筆——對於毫無現實的革命鬥爭經驗，又不見得負有「黑暗閘門」重擔的夏濟安來說，徘徊在古典與現代、個人與集體的魯迅何以成為其生命史中的「大事因緣」？

首先須初步清理夏濟安與美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體制的人事關係，此乃語涉夏濟安，甚至研究戰後海外中國學學術史者一貫的著眼點。陳建忠教授斷言，夏濟安的魯迅論實屬冷戰時期發生於美國本土的「區域研究」成果，但也意識到其論述至精彩處早就突破了冷戰思維的桎梏，流亡身世和文化理念一樣形塑「同情之瞭解」。[9]不過綜合下來，陳文仍將冷戰的建制性遺產強加於人，認為是美國的戰後學術研究體制一手主導夏濟安的魯迅論，未曾顧及到一項重大事實：夏氏複雜的人生履歷對其學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夏濟安與美國的戰後學術研究體制固然表面立場相合，但他也曾多次酷評美國「區域研究」的學術現狀，時時流露出一種獨立理性的研究意識：譬如同是研究魯迅，他就尖刻批評私交不錯的美國漢學家舒爾茨（William Rudolph Schultz，1923-）[10]，直言不喜其博士論文「抄書太多」、「見解很缺」。[11]1962 年 9 月 27 日這封美國「漢學」讀後感可以更具體地看出，夏濟安對戰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究竟抱何態度。這封信花了過半篇幅談論「漢學」，以美國「漢學」與中國清代的「漢學」對比展開：首先自承中共研究「究竟不是大學問」，「真想做學者，還得走漢學一路」；接著便提到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認為「美國的

8 張德強，〈夏濟安文學批評方法淺析〉，《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7 年第 4 期，頁 33-34。

9 陳建忠，〈「區域研究」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冷戰時期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魯迅論〉，張鴻聲、朴宰雨主編，《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頁 215-220。

10 William Rudolph Schultz（1923-）於 1961-1989 年任教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方研究系，方向為魯迅與現代中國文學。這裏提到的論文應是 *Lu Hsün: The Creative Years*（1955），他於 1955 年在華盛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11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頁 114-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nology 恐將成為 knowledge about Sinology」，即對一手材料不熟悉，倒精通「洋人各學說家」的二道販子——事實上，美國學術的本質亦非其所好；真正發自內心認同者，乃個性相近的清儒和王國維這樣追求純學術的近代學人：

> 中國五四以來的 scholarship 方面的成就，很少有人討論過，我是很想討論的。王國維是近代學人，我所最佩服的人，他是 serve holy ghost 的。但要討論他們的學問，談何容易？[12]

戰後在美國興起的「漢學」，基本繼承了二戰中美國政府對東亞之「敵情研究」的特色，強調歷史與現實、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聯繫。夏濟安棲身的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更是以中共研究而著名。[13]這種學術體制作為美國當代政治生態的衍生物，無法全然代表剛從中國流亡海外的知識人在學術、人生上面的選擇，其間的錯位勢必伴隨各種形式的緊張——這並非個別現象，「誰也沒有家」的焦慮使大名鼎鼎如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楊聯陞（1914-1990）者亦極端到精神崩潰的地步；[14]就更不必說胡適（1891-1962）與美國「漢學」、「支那學」家之間的嫌隙了；[15]與擁有美國「藤校」正式教職的夏志清不同，夏濟安作為副研究員，地位非常邊緣，又受體制的直接牽制，碰到的麻煩想必只會有增無減。不過該問題目前實乃一大疑難，非本文所能詳論。至於夏濟安在美國學術機構的狀態，恐怕還停留在寄人籬下的程度：他需要一個施展才華和抱負的地方，但不代表他就徹底為該機構的主張所奴役，遑論文人與制度機器的最終追求本質截然不同，何況擺佈和愚弄向來不分勢力，不分國界。作為一位時代轉型中的學術人物，夏濟安固然在價值觀念上親近美國，但才人的個性和個人的抱負又使他難以安穩寄身美國的研究機構，屢屢表

12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頁 96-97。

13 魏思齊（Zbigniew Wesolowski），〈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漢學研究通訊》第 26 卷第 2 期（2007 年 5 月），頁 31-32。

14 葛兆光，〈「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1977 年楊聯陞回國記〉，《餘音：學術史隨筆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179-181。華人學者戰後在美國學術機構的活動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的大課題，非本文所能詳述。可參考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的親歷（限哈佛大學）：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8），頁 203-230。

15 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的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頁 130-1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出不適應感，因不合本文論旨茲不具引。[16]讀者只需瞭解，這種不適應感令夏濟安與美國「區域研究」之人事關係不再適合用以作為夏濟安研究的理論預設，後來者有必要另闢新的視野。

相形之下，長時段的《書信集》不僅充分展示夏氏兄弟的手足情，且還具有相當程度的日記功能，提供了一個更廣闊之「夏濟安的歷史世界」：品評人物才性在夏濟安致夏志清書信中佔極大篇幅，堪稱瞭解夏濟安其人的一條重要線索。這些人物小到自我、正在交往或交往失敗的異性、共事的同僚，大到大陸、臺灣乃至美國的學術、政治頭目，夏濟安對此都有相當綿密的分析。考慮到他正式的學術著作不算豐富，往往一邊靠匱乏的材料死磕文章學術，同時也「忍不住」在相互交流的片語裏不拘地談文論藝，表露才人的個性，著手批評具體作家的同時，也衍化出一套有關文學與世界（尤其是政治）關係的獨特論述。這些見解固然瑣碎，卻未嘗不可如錢鍾書（1910-1998）所言，成為「自覺的周密理論的根苗」。[17]在生前亦有諸多計畫根本來不及施行的史實前提下，單評價《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1968，以下稱《黑暗的閘門》）中的魯迅論而忽略私人化但不乏識見的《書信集》，以及因故重見天日的若干軼文（詳後）所扮演的角色，不繼續追問，以及完整、復盤和融貫批評文本內在的分裂、發展脈絡和所指涉的現實議題，從一個「夏濟安的歷史世界」中理解夏濟安與魯迅的關係，無異於見木不見林。夏濟安作為學者、批評家，我們應該在他的思想學術史和生命史這一更寬廣的視野中，把握其魯迅論的奧義。

### （二）夏濟安、魯迅與冷戰早期臺灣的政治文化

夏濟安以強調人／文涇渭分明的英美新批評起家，首先關心的卻是魯迅在左聯這一兼具文學與政治性的組織裏的活動和心路，即所謂人或人之「文」的批評，背後的原因值得深思。通過對照魯迅的書信和作品，〈魯迅與左聯的解散〉還原了一個苦悶者的形象：「他嚴厲的外表下掩藏著敏感的神經，『最硬的骨頭』旁跳動著一顆溫柔的心。」[18]面對「我方陣營」的冷刀暗箭，夏濟安

16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115-116。此處夏濟安花了較長篇幅憂慮自己的前途問題。總結有兩點：（1）與華大、柏克萊合作一是謀生，二為了施展才華，但終歸「有求於人」，必須低頭；（2）批評臺大方面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的自大。

17 錢鍾書，〈讀《拉奧孔》〉，《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頁 30。

18 夏濟安著，萬芷均譯，〈魯迅與左聯的解散〉，《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頁 1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認為，軟心腸的表現只會讓魯迅倍加痛苦：

> 這種緊張的衝突，這種我方陣營裏的敵意，這種必須「瞻前顧後」而荒廢精力的無奈，所有這一切本可以讓他變得更加智慧，甚至孕育出偉大的作品，然而他從中毫無得益。幸或不幸，他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更無從與之鬥爭了。[19]

若以《書信集》的披露為準，夏濟安最早在 1959 年 10 月 4 日提及研究共產中國的事宜，一個月之後便開始撰寫該文。[20]時間看似倉促，但只要將該文與他早先發表的〈中國知識人的命運〉（"The Fat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1951）對讀，不難發現「對革命的深厚熱情讓他在有生之年沒能目睹革命的另一面」，實是細化了 1951 年「中國人是一個軟心腸的民族，很少有人有勇氣直視任何事情被徹底剖解」的觀點，表明夏濟安在現代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準備由來已久：

> 在此變動時代，懷疑主義，或者說一種對人類價值觀和信仰的徹底修整，固然會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但在理清思想、界定觀念這個方面，可能利大於弊。但在過去的五十年裏，我們卻並未見到一個當得起懷疑主義者之名的人。這也許是因為中國人是一個軟心腸的民族，我們很少有人有勇氣直視任何事情被徹底剖解，並從中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21]

他也用「軟心腸」這個詞來形容魯迅的摯友、中共前領導人瞿秋白（1899-1935），表明該論點背後，定然少不了夏氏沈潛的思想操練，讀者非前溯不足以得真瞭解。鮮少有人能檢視在學術研究的「史前時期」，夏濟安對文化和政治的現實關懷，更別提將這種關懷與他日後的文學研究事業相聯繫。刊

19 同上註，頁 107。

20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78。

21 Tsi-an Hsia, "The Fat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ee China Review*, April 1951, 126-127. 此處譯文引自南京大學文學院 2013 級博士生陳通造的版本：夏濟安著，陳通造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發表於「豆瓣」，https://www.douban.com/note/704266207/，2018 年 7 月 8 日上網。關於夏濟安個人全部著作的目錄，參見王愛萍，《夏濟安論》（蘇州：蘇州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李進先生指導，2017），頁 4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登此文的《自由中國評論》（*Free China Review*）是今天《臺灣評論》（*Taiwan Review*）的前身，原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創辦，是面向海外讀者，旨在滿足臺灣國際文宣需要的英文雜誌，自 1949 年國府遷臺以來一直都屬於官方媒體。它緊接著還登載了夏氏〈1919 及其後〉（“Nineteen Nineteen and After”，1951）和〈中華文明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1951）兩文，[22]而〈中國知識人的命運〉以犀利的眼光批判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人「軟心腸」，缺乏理智感的內在缺陷，就其論述的完整性和嚴謹性而言，與另外兩篇純粹宣洩情緒的檄文很不協調。儘管該文本的收束段落亦不免立場先行之俗，但這也恰好說明，夏濟安的學術事業很大程度乃因世變而起，而「理清思想，界定觀念」給人以邏輯清醒感，意味著他的立論已逸出一時一地之政治情勢，與《自由中國評論》雜誌宣傳反共的主旋律不相協調——文學與政治的緊張初現端倪。據筆者觀察：這些文章發表以前，夏濟安全無闡述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議論；發表後，他對此興趣日益加深，執教臺大外文系期間即已迭出有關論作，並最終在 1959 年後上升到嚴肅研究。加上在中國文化的世變之際，出於對自身認知的調整，做出不同抉擇的文人都會比以往更關注「何為知識人」和「知識人何為」的課題，包括作為流揜者的夏濟安。考慮到此文重大的著眼點及其深切的現實關懷，〈中國知識人的命運〉大可被看作夏濟安後期文學思想迸發的導火索。

在他反思中國現代知識人命運的過程中，由於統合了文學和政治兩方面的複雜性，魯迅順理成章成為最值得首先關注的個案。回到夏濟安筆下的魯迅，可見反思知識人精神的議題獲得了饒有自覺的對象化，而魯迅的代表意義又補充並深化著議題自身。魯迅貌似有直視任何事情被徹底剖解的道德勇氣，1927 年後的左右彷徨卻又代表他另有用意——因著這層特殊的共鳴與間隙，夏濟安得以洞燭魯迅「冷眼」和「熱心」微妙的倫理機微，進一步詮釋中國現代知識人在文學和政治實踐過程中遭遇的轉型困境，使作為觀察對象的後者更立體、生動。但與此同時，如果看不見夏濟安背後的複雜政治背景和作為思想中介的魯迅的關係，上述這些聯繫並不足以真正坐實。

被個體／集體撕扯的政治體驗，無疑給夏濟安把握魯迅在左聯派系活動中始終跳動的那顆「溫柔的心」提供了可參照的現實情境——上海文壇之於魯迅一如臺北文壇之於夏濟安，兩個歷史空間遙相呼應：魯迅在官方明令禁止閱讀，

22 Tsi-an Hsia, “Nineteen Nineteen and After,” *Free China Review*, May 1951, 113-114. Tsi-an Hsia, “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ee China Review*, September 1951, 102-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甚至淪為反共意識形態工具的情況下，[23]還被夏濟安主動選為觀照和批判現實的思想媒介，兩者的關係一開始便非同一般。在 1951 年 3 月 22 日的信中，他交待〈中國知識人的命運〉的寫作，離不開他對「戒嚴」時期臺灣島內文壇、政界風氣的針砭，已顯魯迅的氣質，同時他也清楚「在臺灣發展，還不大方便」。[24]日後他選擇滯留美國遲遲不歸，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國家利益」，[25]而是因為「覺察出危機」，強化著對臺灣政治情勢的省察：對於臺灣當代政治史而言，1959 年可是個非比尋常的年份，11 月「正預備開國民代表大會」，蔣中正（1887-1975）準備「三連任」，各方勢力蠢蠢欲動——尤其是胡適、雷震（1897-1979）和英千里（1900-1969）等自由主義中人為了反蔣連任而活躍異常，尤其雷震，絲毫不覺人身入獄、雜誌被封禁等厄運即將降臨；[26]後兩位亦有意拉攏同在圈內的夏濟安參與其中。但夏氏對政治的態度相當冷靜，身不由己唯有飽受「黨爭」之苦。由於同時要給《自由中國》供稿，夏濟安與雷震有不少往來，但隨著雷震在政治上動作頻頻，兩人的關係生變。《雷震日記》1957 年 2 月 27 日有記：

> 夏濟安說，他不敢給《自由中國》寫文章。[27]

23 古大勇，〈臺灣「戒嚴」時期和大陸「毛澤東時代」兩岸的「魯迅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 年第 11 期，頁 93-94。楊傑銘博士認為夏濟安的兩篇魯迅專論「存在批評國府體制的隱喻」，「也是對兩岸文藝政策的省思」，接近筆者的思考方向，但諸論斷尚缺史料佐證，亦欠深入時代背景。見楊傑銘，〈海外的回聲：魯迅《野草》中黑暗面的研究及其演繹〉，《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臺、港傳播與演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許子東先生指導，2014），頁 153-154。

24 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0-19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 48。

25 張鳳棲，〈我所知道的夏濟安〉，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主編，《永久的懷念》（臺北：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頁 31。

26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臺灣自由主義知識人與政治權威的交戰以胡適最為典型，是臺灣當代政治史的重要段落，參見黃克武，〈蔣中正、陳誠與胡適：以「三連任」問題為中心（1956-1960）〉，黃克武主編，《1960 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頁 59-172。

27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日記（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頁 38。由於思想、立場接近，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與雷震主編的《自由中國》兩家雜誌淵源深厚，參見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頁 340-3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書信集》同時期的相關內容對讀，可知雷震所以為的「不敢」絕非怯懦，而是負壓狀態下的深思熟慮：與表面政治權威的專制獨裁相比，更深層的知識人「黨爭」同樣值得警惕，其根源之深、克服之難可能還遠甚於前者。在這種情勢下，魯迅及其文學便給夏濟安以某種啟發：照他觀之，魯迅的風範能一掃臺灣文人、政客烘出的「烏煙瘴氣」。[28]別忘了，我們是在帶有私密性的書信中觀察到夏濟安的思想活動的：這種寫作一方面揭示文論家在冷戰早期所承受的政治壓力，自成其時代典型性，說明美國時期很大程度上是臺灣時期的延續，臺灣時期又是〈中國知識人的命運〉所拷問的大陸時期的延續，因此夏濟安面對的實是中國文學在冷戰早期全球政治語境中的再轉型，但他之所以能把魯迅的政治鬥爭史分析得頭頭是道，離不開臺灣時期的政治閱歷；此外從生命體驗的媒觸到學術研究的對象，夏濟安認識魯迅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d）過程提醒我們，在世俗壓力面前，文學仍自有它不甘屈服的力量，冷戰早期的文學生態亦不能用文學與政治的二元對立範式涵括，有必要重新構思兩者的關係。

這一共鳴加深著他對魯迅的認識，促成文學話語和政治論述相互支援。夏濟安以思想自覺代替行動「自覺」，避免政治風險之餘，對五十年代臺灣自由主義知識人的政治思維方式和政治行動風格有了相當深刻的把握。1963 年 8 月 9 日，當談起弟弟和普實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的筆戰時，他直言「很怕和人筆戰」，原因之一即「受魯迅影響太深，一筆戰恐怕要犯魯迅的尖酸刻薄強詞奪理的毛病」，雖然「在臺灣時，頗有筆戰的機會」，但他的態度卻是「一概不理」，有其對魯迅思想的自覺取捨。[29]回到 1959 年 10 月 18 日的臺灣觀察，文學主體和政治介入的緊張感實在演繹他內涵豐富的政治觀：「政治很複雜，問題如單線解決，總是顧此失彼的」。[30]下文的生動譬喻，用從文學作品中領悟出的世情來詮釋政治行動本身的曖昧：學者文人涉足政治多出於一廂情願，最終難免為政治所反噬。由此而來的暴露，反襯著文學話語的批判本色——如此便解釋了〈魯迅與左聯的解散〉裏，夏濟安對魯迅熱衷「普羅」之餘的「顧此失彼」所抱的批評自覺：

> 學者文人加入某一政治團體，大約同女人和某個男人結婚情形相若。可能她只是想男人，而偏偏該男人追得甚緊而手段高妙，她就結婚

28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92-95。
29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頁 329。
30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事實上，她不一定就對該男人滿意的。[31]

這段話回應的，正是〈魯迅與左聯的解散〉集中討論的魯迅的政治失敗。《書信集》的意義在於，它從共時性的角度出發，讓讀者意識到，形式主義文論家把握美學細節的同時，還有可能在頻頻「背叛」自身立場而自覺思考政治，用處理美學細節的眼光辨析政治的細節——包括政治體制對作家的形塑以及作家間的人際政治——並於日後將這些思索反哺到自己的批評當中，成為挖掘作品美學特質的一大發力點，從而構造文學話語與政治論述之間的張力；未必如一般文學史家想像的那樣，只是死板保守的形式主義分析機器或某種僵化意識形態的附庸。

夏濟安於 1950 年 10 月抵達臺灣，前後在臺工作生活近十年。若把他的批評置於魯迅在戰後臺灣文化界的傳播脈絡中看，讀者或能更好地體悟夏氏思想在當時文人圈內的特色。討論「魯迅」在戰後臺灣的傳播時，簡明海博士梳理出許壽裳（1883-1948）、楊逵（1906-1985）和鐘理和（1915-1960）三個典型：這幅鳥瞰圖告訴我們，魯迅更為戰後臺灣文人所接納的仍是反壓迫和改造國民性等左翼主題，值得注意的是許壽裳意欲以魯迅精神為資源展開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國化」，顯示魯迅在戰後臺灣文化重建脈絡中扮演的特殊角色。[32]相比之下，下文將會揭示，夏濟安不循左翼知識人憂國憂民的常規，而是繼承魯迅對知識人、文藝和政治的批判遺產，通過反思左翼文學潮流來反思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他的例子可謂為目前戰後臺灣的魯迅接受研究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由於政治取向終歸相去甚遠，魯迅的革命文學論，尤其是與蘇聯有關的部分，遺憾地未能引起夏濟安太多分析。研究魯迅等中國左翼作家已讓他意識到蘇聯的重要性，[33]然而在〈惡魔在天堂：中國人眼中的俄國〉（“Demons in Paradise: The Chinese Images of Russia”，1963）一文中，夏濟安認為魯迅的蘇聯觀和彼時大多數中國左翼作家一樣，未能擺脫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偏見。[34]這種觀點深受當時正在惡化的中蘇關係干擾，誤以為蘇聯文藝只有日丹諾夫主義（Zhdanovism）這種教條文學可講。其實在托洛茨基（Lev Davidovich Trotsky，1879-1940）「同路人」（Poputchik）文學觀的影響下，只要創作自由受到政治

31 同上註，頁 95。

32 簡明海，〈戰後五四意識的斷裂與接榫〉，《五四意識在臺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薛化元、劉季倫先生指導，2009），頁 89-111。

33 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頁 202-203、364。

34 Tsi-an Hsia, “Demons in Paradise: The Chinse Images of Rus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49, no. 1 (1963): 36-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威脅，魯迅都會毫不猶豫地站在文學這邊，他與蘇聯的關係並沒有那麼不堪。[35]

就在同年，夏濟安發表〈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1963）。此作因同樣研究「聖人」，方法論相近，可與其魯迅專論對讀。生活、藝術和意識形態三者間的關係亦是夏氏讀解魯迅文學的角度，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亦反映著其人與新批評、左翼文學之間的複雜互動，無疑將影響我們對他的最終評價：

> 一旦他開始費神研究人們究竟是怎樣說話、行動和思考的，他就必然接觸到真實的生活了；生活是一個比意識形態更為廣闊的世界，有無數的人物、東西、事件和錯綜複雜的關係，它們跟意識形態相互牴牾，或者不能為意識形態所解釋。[36]

將新批評的思路延伸到社會層面，即社會的「文本化」，並用它解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經典概念「意識形態」（ideology），算是突破性嘗試：「意識形態」被內含於「真實生活」，「真實生活」不是沒有「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的自洽、封閉決定了它無法解釋「真實生活」中「人們怎樣說話、行動和思考」，可見在「意識形態」喧囂塵上的六十年代初，他並沒有像一般新批評人士那樣，背誦神聖化「真實生活」的義理，只是反對將「無數的人物、東西、事件和錯綜複雜的關係」，亦即各種鮮活細節悉數化約為「意識形態」，滅失生活作為生活所應有的鮮活感。

所以不難理解，夏濟安為什麼會先行完成〈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即先對魯迅與左聯的恩怨作一番澄清，尤著意鉤沈其中的細節，再深入研究他的文學；而不是顛倒，或像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分析魯迅那樣，只專注文本的各種諷刺和象徵技巧——[37]表面上看雖是揭示政治左右文學的荒謬，可結合夏濟安、魯迅與戰後臺灣的政治文化之批判性關係，以及他的才人個性，「真

35 夏濟安的這一疏漏，最終為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長堀祐造教授所填補，參見：長堀祐造著，王俊文譯，《魯迅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臺北：人間出版社，2015），頁 43-67。

36 夏濟安著，李俐譯，〈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頁 241。

37 夏氏兄弟同為新批評出身，然夏志清的魯迅研究具有非常典型的學院派風格，迥異於夏濟安的魯迅專論，可比較夏志清著，李歐梵譯，〈魯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 23-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生活」主張回向生活的（也是歷史的）細節以求「實」，其於論述所挑戰的又是整個時代泛意識形態化的氛圍，而非具體的黨派立場。他言政治卻意在論文學，介入的遠不限於戰後臺灣的文學—政治論辯，而有更深層的內涵。

### （三）從魯迅批評到新古典主義文論

在為《夏濟安選集》所作的序中，陳世驤有感於相通的「新潮」世變——無論是「西學」衝擊「中學」，還是文學陷落於政治的形勢，冷戰早期和南朝頗有氣息相通之處——有意並置夏濟安和劉勰（約 465—約 520）。[38]劉勰以《文心雕龍》著稱於世，不僅是批評家，還是文論家，說明陳氏的比較自覺已意識到夏濟安非同一般的批評家。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夏濟安與劉勰有直接的思想聯繫，但不妨礙我們沿著陳世驤的思路繼續出發。必須聲明的是，囿於文章論旨，筆者僅從批評視野、知識資源和人際網絡三個相關層次初步論證支援夏氏批評魯迅文學的視野轉向，尤側重解釋這種支援動作對他創造性解讀魯迅精神所起到的意義；至於起到支援作用的基座本身的整體理路，則有待他日另闢專論解決。

夏濟安從來都不是在孤立地關注作家或作品。余夏雲教授已注意夏氏的「五四」情結，但為什麼非提「五四」不可，余文輕易放過其中的歷史複雜性。[39]而且夏濟安自認異於彼時謳歌「五四」精神的胡適、殷海光（1919-1969）和雷震等「自由中國」派知識人，斥後者的自由主義路線為「淺薄」。[40]那麼和臺灣自由主義版本的「五四」相比，夏氏「五四」有何獨到之處，余文亦缺進一步的對比和論證。我們有理由相信，是文學、歷史和政治多線索的交錯推進，把夏濟安推向視野更開闊，更具文學性的實踐，迫使他不得不回到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座標原點——五四運動那裏展開根本性思考的。

夏濟安對五四運動的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1 年 1 月，此番議論中的「中國的傳統」、「古典主義」等術語，爾後還會以相近的面目繼續出現。雖僅限提出問題，但已可見其初涉時的野心和格局：

---

38 陳世驤，〈序〉，夏濟安，《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頁 4-7。

39 余夏雲，〈現代性的政治——論夏濟安左翼文學研究的意義〉，《南京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1 期，頁 119-120。

40 「討論 liberalism 這種文章是吃力不討好的，雷震他們（還有殷海光——即殷福生）奉羅素為教主，以 liberalism 為教條，我看了也不大滿意。他們是代表臺灣文化的淺薄的另外一方面。可是假如臺灣沒有他們那本雜誌，臺灣的思想界將更形單調了。」夏濟安對自由主義也不滿意，見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5-195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2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 Eliot 竟然亦成為我所最佩服的人，我對於中國文壇的野心，倒不想寫幾部小說，而想創導一種反五四運動，提倡古典主義，反抗五四以來的浪漫主義。……我很想寫一部中文的《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可惜學問不夠，一方面當然應該介紹 20 世紀的古典主義運動，一方面我對於中國文壇亦應該有積極性的建議：中國有自己的「傳統」，確立中國的傳統需要對於舊文化有深刻的研究，這是一件可做一生的工作。[41]

而具有實際意義的表現，還是其魯迅專論中在文學文化性五四運動的視域下，建構出胡適—魯迅—周作人（1885-1967）的序列，並拔高魯迅的特殊性。對於當時普遍政治兩極化的文學史觀來說，將這三位走向迥異，而且處於同一時空，相互間的交往甚有歷史話題性的知識人擺在一齊討論，可謂別出心裁。而提出這樣的獨特序列正好能說明，夏濟安在何樣的眼光、視野下開展他的魯迅論：

> 如果把五四運動看作除舊立新的群眾運動，魯迅的確不能作為真正的代表人物。……他從未達到胡適、周作人的寧靜境界，但比起這兩人，他也許才是更加偉大的天才。[42]

其次是對五四運動的陰暗面的洞察，初步展現夏氏的幽暗意識：

> 五四運動被人認為是個人的覺醒，但五四以後個人地位越來越不重要。舊桎梏，本已腐朽，而新桎梏束縛力度之大，更是前所未見。一切問題，只求現成答案，個人心智很少有展開的表現。[43]

所謂「只求現成答案，個人心智很少有展開的表現」便概括了魯迅悲劇性的政治境遇，但更重要者說明，拔高魯迅的特殊性也是在批判五四運動的啟蒙現代性，試圖真正解放源於舊傳統，被現代性壓抑的「個人心智」，進一步提示在現代性來勢兇猛的情況下，個體生命完全有可能因傳統因素的釋放而獲得表達、

41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0-1955）》，頁 37。

42 夏濟安著，萬芷均譯，〈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頁 139-142。

43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頁 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思考的自由，顛倒主流的傳統觀以達成「反現代」能效：〈魯迅作品的黑暗面〉（1964）對魯迅文學中私人化美學的發掘，堪稱絕佳例證。與此同時，這種發掘也是受到了夏濟安對五四以來知識人概念的個人化解讀驅動，後者也直指他對五四運動政治—文化現代性所表現出的幽暗意識。

王家平教授很欣賞夏濟安能如此深入地探討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複雜關係。[44]但《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的傳統式比較文學方法論提不起任何興趣探討，這種難得發現背後耐人尋味的歷史成因，更別說開闢文學與歷史的對話空間；此外以冷戰為界來書寫百年傳播史，實在是有意看重冷戰的政治日常化對魯迅海外傳播造成的消極影響；且凡一名學者被判定為「誤讀」了魯迅，王著便難掩不屑，未嘗沒有本質化魯迅的嫌疑。與王著不同，筆者著重從歷史中其人的內外兩面來考辨夏濟安與魯迅的關係。其間，冷戰的特殊性實該被理解為一難得之機遇，魯迅的文學也應該是不問立場偏好，而可以對所有可能的人開放的資源：不得不承認，正是冷戰的大變局迫使夏濟安走出傳統新批評的書齋式知識參與，主動與危機中的歷史展開文學—政治辯論，成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謂的「同時代人」，魯迅則是這條路上的里程碑。

夏濟安早在〈中國知識人的命運〉時已十分關注現代中國的知識人主體，這種介入也難免向他的自我定位延伸。知識人的自我定位涉及其人的終極目標、實際作為，乃轉型時代其人安身立命之核心問題，不可小視。在夏濟安這裏，對他個人產生重大影響的，首先是二十世紀英國著名詩人、批評家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1888-1965）：

> 近讀 Eliot 的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我覺得我可算是社會中的 elite 的一分子。但我是屬於封建社會的，其 elite 在中國即所謂「士大夫」，他們不治生產，而敢於用錢，講義氣，守禮教，保守懷古，反對革新。[45]

此時的他客居香港跟宋淇（1919-1996）做生意打零工，心境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苦悶和徬徨」，卻不妨礙他從艾略特身上尋求精神慰藉，仿〈荒原〉（*The Waste*

44 「他的這篇論文（指〈魯迅作品的黑暗面〉）是本時期歐美魯迅研究學術價值最高的成果之一」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8-179。

45 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47-195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頁 3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nd*，1922）寫下長詩〈香港——一九五零〉（1950），呼應艾氏在危機中對秩序重建的訴求，[46]可見「最佩服的人」誠非虛言。夏濟安還批駁同道錢學熙（1906-1978）、朱光潛（1897-1986）對艾氏的看法，以「艾略特信徒」自居（1951 年 3 月 22 日）：他將艾氏的 elite 翻譯成「士大夫」，實屬有意的時代錯置（anachrony），即他越景仰艾略特，也就表明他越想成為真正的「士大夫」（elite）。根據前文提到的他對文學—政治關係的高度關注，我們很自然地注意到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1948）中唯一集中處理該話題的"A Note on Culture and Politics"一文。這篇文章精心討論「士大夫」的優勢和責任，體現文化與政治的相生相剋，也在某種程度左右了夏氏魯迅論的論述策略：

> 政治菁英的關係——我們說的是所有有能力、有威望的政治團體中的領導者：為了維護仍存的議會系統，他們不得不常和反對派共進晚餐——對於其他菁英而言，我們將這種關係描述成思想者（men of thought）和行動派（men of action）間的交流，未免太過草率——這毋寧說是不同頭腦類型的，和不同領域的思想者及行動派人士間的關係。相較於宗教，政治生活中思想者和行動派區別不大，遑論沈思者自有其行動，靈修中的牧師未必全無事功。除了體制的自行運作，在主動的生活中，沒有哪一個層面能忽略思想；沒有哪一種思考能對行動毫無影響。[47]

所謂思想者（men of thought）和行動派（men of action）的相輔相成，表明 elite 一詞具有政治和文化的雙重內涵，艾略特「古典主義」的文化實踐無法和他「保皇派」（保守主義）社會思想家身分割裂——往日識者多津津樂道於夏濟安引介〈傳統與個人才具〉（"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對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發展的影響，[48]對這一動作本身的文化—政治雙重指歸，及其後續對夏氏個人政治自覺的形塑則闡發不夠。以上線索也貫穿魯迅的政治人生與文學實現之關

46 金理，〈從夏濟安的《香港——一九五零》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零》——一首詩與一篇小說的關聯閱讀〉，《上海文化》2010 年第 6 期，頁 46。

47 Thomas Sterns 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84. 原文為英文，譯文為筆者自譯。

48 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朱南度譯，〈傳統與個人才具〉，《文學雜誌》第 8 卷第 3 期（1960 年 5 月），頁 22-29。關於夏濟安對艾略特的引介，詳見黃維樑，〈艾略特和中國現代詩學〉，《中國文學縱橫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頁 111-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順勢構成夏濟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和〈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兩文微妙的內在關聯。故對於「士大夫」來說，兩者相輔相成，也就是思想者的思想本身就帶有行動的主體性，加之「士大夫」以「懷古」精神為主旨，所以其行動性往往蘊含在「懷古」精神神往的傳統當中。受艾略特的新古典主義影響，夏濟安突破了新批評文本專業主義的限制，得以在具體社會—歷史語境和具體時空中感受和闡釋魯迅及其他中國現代作家的同時，又能肯定其中傳統因素的現代性價值。[49]可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中國沒有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而已」：[50]自清末以來激進主義的壟斷地位和知識人政治—文化地位邊緣化的大趨勢，[51]以及戰後國共分治的兩岸形勢乃至美蘇對抗的世界格局，凡此種種時代限制注定要讓夏濟安版本的新古典主義難以像艾略特之於戰後英國社會那樣，自有其政治、宗教及文化的正當性，而是不得不表現得更為隱微曲折。

投射到魯迅論中，他從魯迅早年觀賞目連戲的經歷入手，發現作品的民間舊文藝元素比起需要面向群眾的其他方面（如雜感），更能突顯作家的至真性情：

> 目連戲的人物以無常、女吊最為突出，他們可怕的外形讓魯迅一生都為之著迷，而魯迅也以他們為題，用最佳的文才創作出兩篇奇文。把這兩篇文章放在魯迅的全部創作裏來看，這些鬼魂不僅體現出他的學識、機智與懷舊之情，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代表死亡的可怕和美麗，以及濃妝豔抹背後生與死的謎題。[52]

通過對《野草》的介入式批評，他還主動設想了可能的魯迅——批評隱含的主體暗示，這裏的「他」未嘗不是可能的「我」：

49 李兆前，《影響的焦慮：T．S．艾略特和 R．威廉斯文化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 226-230。

50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頁 211-212。

51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2），頁 33-50。

52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頁 1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但他如果把這夢的煩擾寫成詩，現代詩也好，古詩也罷，原本可以將中國詩歌引入一個新的境界，在傳統古詩的豐富內涵之外，傳達全新的主題，表現恐懼與焦慮，刻畫現代的經驗。[53]

夏濟安頗稱道魯迅一向不為世人所關注的舊體詩。這種返歸自身的「過時」藝術游離於歷史潮流外，魯迅「因襲士大夫文化」，以夏濟安定義的「士大夫」身分將舊詩的寫作當成「一種挑戰，一種自我實現」，與歷史（政治）潮流進行緊張的辯難，在夏氏眼裏可謂頗見力量感和尖銳性。[54]參照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我們可以說，他定義的「士大夫」更接近甚至就是《春秋左氏傳》中那些有志於道，個性堅忍不拔的封建士大夫，而非日後甘當帝王一姓家奴的官僚士大夫——通過對比日本和中國，夏濟安明確指出這層微小但深刻的區別：

>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政治社會制度和人生哲學等，都很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他們的 samurai，就是中國的「士」，為人講究氣節，說死就死。……中國人分士農工商，日本亦然，但是中國後來的士，成為文弱之士，日本的士，還是文武雙全（至少武勝於文）。中國自秦以後，成為「官僚政治」，風氣一直到今日之臺灣不改。[55]

引胡適的樂觀、周作人的悲觀作對比，他指出魯迅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微妙深刻的感情，記錄了「光與暗之間，無數深淺的灰」，進而指出「他（魯迅）代表的是新與舊的掙扎，和超越歷史存在的更深層次的衝突」，為魯迅重新注入超越歷史存在的批判能量。[56]體會作家的苦衷之餘，夏濟安的介入式批評也給出魯迅創作的別樣可能：可這種設想與其說替魯迅考慮，不如說暗示了夏濟安的理想：二元對立已然打破，傳統資源和現代經驗完全可以交相輝映，而不再陷於僵戰狀態，表明他同時也在宣示自己的新古典主義文論，銳意革新冷戰早期中國文學的慘澹現狀，向窒息文學文化的強勢政治力量發出挑戰，企圖借魯迅的「黑（灰）暗面」來召喚文明重生（復興）的光明面，有意回應五四以來始終熱度不減的「文藝復興」課題。

---

53 同上註，頁 133。

54 同上註，頁 131-132。

55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52-53。

56 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頁 139-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實早在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就讀期間，夏濟安和他的文學同道就不少接觸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人的英國古典主義文學思想。[57]但這些研習和認同若沒有具體的生成史背景作為轉換中介，夏濟安的轉型便猶如存在於歷史真空之中，他以局外人的身分能洞察具有較高隱秘性的左翼文學運動也顯得突兀。事實上，他的新古典主義同時還在與其他文化共同體的交往中逐步鑄就，反過來使他對艾略特的消化更具在地性，加速形成自身融文入史的獨特文風。他彼時的交遊可謂赴美前個人智識生活的重要面相，也算冷戰早期港、臺兩地文化互動的縮影，其深意非本文所能詳論；讀者目前只需明確，對此他具備鮮明的人際自覺，其想法亦由人際網絡滲透到知識網絡，最終呈現於論作的觀點。在《文學雜誌》的發刊詞〈致讀者〉（1956）中，他便明確提出雜誌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宣導「樸素、理智、冷靜」的文風，[58]被梅家玲教授認為樹立了以嚴肅態度討論文學的風氣，其風格同為民主政治大聲疾呼的《自由中國》判然有別，[59]對自由主義政治觀的批判更是表明夏濟安難同後者混為一談，「數千年」的超政治措辭亦使其實際表現出比臺灣自由主義者更強硬的批判姿態。

〈舊文化與新小說〉（1957）則從首肯新儒家思想反功利主義、反集體主義（夏氏於括號中特別註明，這種集體主義包括「蘇聯式的強制服從」和「美國式的一窩蜂盲從」）潮流的批判性入手，類比俄國文化、英國新教文化和美國南部文化，設想利用中國的「儒教文化」來創作小說，浮現作者任教新亞書院時與文化保守主義者往來的痕跡：[60]寫小說首在立得住人物，他敏銳察覺到孔、孟二聖對具體歷史人物的省察便可供小說家利用，在當下（contemporary）

57 孫連五，〈夏濟安的大學成績單〉，發表於澎湃上海書評，〈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159060〉，2020 年 9 月 14 日上網。

58 夏濟安，〈致讀者〉，《夏濟安選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 209。

59 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指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6 年 2 月），頁 15。

60 夏濟安在香港新亞書院停留的時間固然短，但同文化保守主義者如錢穆（1895-1990）等人的交往一直不斷。1960 年夏濟安留美期間，錢穆應邀在耶魯大學講學，兩人得見，錢仍希望夏濟安回新亞書院教書，可窺他對夏氏的認可，見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286；這不是錢穆的第一次邀請，見《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5-1959）》，頁 172。夏濟安對錢穆的學問確有真的欣賞：「目前中國人讀古書讀得頂熟的人恐是錢穆，如讓他來主持考試，美國許多漢學家（已成名的）恐怕將要一敗塗地」，見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頁 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境中清醒和深入地判斷儒家所提出的道德問題／危機，塑造回味無窮的人物處境。[61]

雖然在交往過程中對新儒家思想的批判性、歷史性有好感，不過夏濟安長期浸淫英美文學，深諳看重「個人心智」的西方人文價值觀，故我們又不便籠統地歸他到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但可以肯定，兩路人馬的思想氣質在他身上產生了意味深長的混融，引起夏氏對這兩種主體的深度辨識，這一思考亦隨即內化入其文學研究中。

這種影響體現在，夏濟安比臺灣自由主義更重視傳統，進而發展出一種從新儒家那裏吸收過來，自由主義者不甚在意甚至嚴加排斥的歷史意識，故能更靈活地與不同時空（尤其是被現代性貶抑的「過去」時）中的各類理論資源對話。這種知識雜交現象也從生成史角度解釋了，在一個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為何偏偏就他獨具慧眼，最早肯定瞿秋白做出過同類型的對話，甚至可與後冷戰時代的學者比高低。[62]

說到底，夏濟安無意為冷戰早期各種意識形態鬥爭的狹隘所框束，並逐漸學會在個體性和發展，而非意識形態的規定性中，理解作為現代轉型中重大文化史事件的中國左翼文學運動及共產主義思潮；又比香港保守主義更認同西化，確認現代人文價值觀的合法性之餘，不至於濫用歷史和空論自由，僅僅扮演自由主義佈道者的角色。所謂「新古典主義」主要強調一種冷戰早期政治語境中形成的歷史意識——在夏濟安處具體化為對魯迅，對「五四」，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傳統化也是歷史化，繼而把整個中國文學視作「活動的傳統」，並在左翼文學研究的實踐中完成艾略特文論的東亞在地化——視古典傳統為革新文風的契機，追問前者在反詰現代性人文危機的作品中獲得全新意義的可能性，最終揭示「士大夫」體認的「傳統」蘊藏的動能。

李歐梵教授等的「人文主義」說固然是對夏濟安的通行評價，但勘察各種資料後看，該說至多只能簡陳夏氏的新批評師承，難以向世人傳達他有意與時代流行文化政治思潮展開激烈交鋒的反叛意識——相比之下，「新古典主義」一詞在同語境中突顯的張力倒更能滿足這一要求：在二十世紀中國，許多知識人都有資格被稱為人文主義者（如吳宓、梁實秋），但並非誰都敢像夏濟安這樣，在冷戰早期這種政治情勢緊張的關頭，提出作為一種反潮流呼籲（appeal）

61 夏濟安，〈舊文化與新小說〉，《夏濟安選集》，頁 10-11。

62 「事實上，在瞿秋白研究的領域裏，這種對瞿秋白思想中的知識雜交現象持肯定態度的學者（夏濟安）相當罕見。」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

的新古典主義論述，且突顯文本以內種種方法、立場的衝突所形成的張力。[63]新古典主義在歐洲其來有自，但我們更應該銘記其創造性的一面：二十世紀初艾略特、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等英美文人的新古典傾向，利用歐洲文學傳統反思、批判現代文明對人的異化，開創了嶄新的文學風氣。中國古典文論對召喚傳統一向頗感興趣，而且充滿批判意識地聯姻文統和道統：劉勰的「道」乃神明之理也，還帶有一定的神秘色彩，[64]但以「道」—「聖」—「文」糾正其時不良文風的意圖很是明確；發展到後來的唐宋古文運動，古代士大夫向傳統看齊意味著培養文章的嚴肅理性精神，並藉此修身養性，[65]同時內嵌「匡救政俗之弊害」的目的。[66]可凡此種種皆在「聖道王功」的格局下進行，士人與統治階級在倫理上尚有合拍的應然性，面向傳統的寫作最終不過將傳統本質化、理想化，欲造就作者與外部世界「合一」的和諧詩學。[67]

冷戰早期的情況完全不同。首先古典文化已被打倒，不再存在一個有能力整合社會政治秩序和文化道德秩序的普遍性框架，文學亦不必拘囿於這種普遍框架。從五十年代初開始，通過傳統化五四運動後的中國文學，國共兩黨從各自路線出發，皆徹底否定「現代中國文學」確立的人道主義精神，迫使作家要麼與官方意識形態合流，要麼轉入地下或就此擱筆；[68]復次，誠如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927）所言，「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

63 「我們雖然有提倡『新古典主義』的嫌疑，其實我們的主張比胡適等五四時代的理論家更新，更看重『白話』。」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5-1959）》，頁 211。亦可見夏濟安致彭歌：「事實上，古典主義在中國決不會成為一個潮流；提倡『古典主義』，無非使文學風氣不致太『浪漫』而已。」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第 1 卷第 1 期（1972 年 6 月），頁 114。有趣的是，筆者查遍夏濟安的所有著作，發現他從未使用過後人熱衷於對他使用的「人文主義」概念。

64 張健，〈文道、才性與心術——文心雕龍幾個理論命題及其在中國文論史上的地位〉，《學術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122-123。

65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頁 41-42。

66 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 324-326。

67 蔡宗齊著，劉青海譯，《比較詩學結構：中西文論研究的三種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95-97；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王柏華、陶慶梅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 195-196。

68 Xiaojue Wang, *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 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28-29, 44-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使它漸漸分離」，[69]現代知識人和政治體制各自立場推至根本處，實乃方枘圓鑿。不幸的是，「道不行」，知識人身上的政治包袱，連「乘桴浮於海」也未必能夠卸掉——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現代性的衝突、缺憾由此突顯。夏濟安的新古典主義文論以徵實的眼光，在孤獨魯迅身上發現了所謂「士大夫」精神，繼而深刻體認到這種悲劇性，與當時的進步主義、烏托邦主義形成鮮明對比。過去的研究者通常認為，這種新古典主義充其量是夏濟安對新批評教條的複述，或片面解讀為流亡文人的形影相弔。其實它主動打破本質主義的文學觀，積極介入當時文學—政治辯難，構建「反現代」的反叛創作意識這一激進面相，從來不容低估。

王德威教授為現代中國文論的研究做出示範，但「詩」、「興」和「詩史」的探討聚焦的是古典文心的現代遭際，如魯迅的摩羅詩學便還來自中國詩學辯證的內爆（implosion）。[70]可摩羅詩學源自魯迅早年留日期間的思考，屬於開天闢地之際的新／舊膠著；其人生命史後期的起落，則為魯迅詩學帶來更深一層的張力，觸發「超克現代」的神思：通過從艾略特出發，繞道魯迅建立起的文學思想譜系，夏濟安暗示召喚傳統還有更為迂迴的智慧和方式。他發掘「士大夫」現代文心的思古幽情，擊碎現代性時間觀的二元對立，藉魯迅文學申論「傳統」的激進性，代表融合懷舊／古與抗爭的想象世界和議論空間——「士大夫」是夏濟安理想的現代知識人主體，更是理想的文學創作主體。而且創作主體，即文學的地位還得高出一頭，再度印證他在文論方面有著獨特的構想：

> 對於人生、社會的意見，頂好還是用小說、詩的形式表現出來。政治社會問題大多都很複雜，說理文章很容易陷入自己建立的邏輯陷阱中。從事創作藝術的人，不必求「自圓其說」，寫論說文的人，總得要「自圓其說」，但常常很難圓得過來。[71]

此處兩種文體的價值對比頗有古典文論中辨「文」／「筆」的遺風。他對小說、

69 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第 7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116。

70 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5 期（2017 年 7 月），頁 294。

71 王洞主編，李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451。夏濟安的雄心是用英文寫小說，1944 年初次見到張愛玲時曾自稱是對方的「competitor」，見哈金，〈成功的迷津——張愛玲的英文小說〉，《湖臺夜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頁 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詩的偏愛，甚至指出它們作為虛構性文類，一樣可以表達對人生、社會的意見，不僅意味一種美學選擇，更與其對專門操持「說理文章」的現代中國「文人政治」的批判一脈相承。但主體必須有所憑藉才能突顯自身，因此他從政治人生入手反思魯迅的不能，又在魯迅的政治實踐和文學實現交織出的強烈孤獨感中，指出「傳統」蘊藏的強韌激進能量，對抗與反詰中形成的共同思想空間召喚出落實在文學創作的傳統動能，由此得以窺見新古典主義文論的主體解釋學，為現代中國文論添一可能的向度。故筆者所指陳的「新」，至少包括兩項意義：（1）整合了艾略特與魯迅在創作和批評中形成的文學思想資源，從而打破傳統古典主義者（包括新批評主義者在內）形上的「正典」、「至文」觀，歷史地考察文學傳統與當下可能存在的一切批判性連鎖；（2）充分發揮文學傳統主動介入時代論辯的能力，同時一反 1917 年文學革命以來把文學權當建構現代國家、現代國民之工具的潮流，轉又拔高美學獨立的正義，在文學與政治相互角力的過程中，他指出傳統竟還有把文學從瞬息萬變的歷史潮流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

與為各種政治團體所誇大／矮化的「魯迅傳統」、「魯迅精神」不同，夏濟安的「士大夫」版魯迅取得了文學—政治層面的另一種普遍性。在寫給《現代文學》雜誌社編委的《祝辭》（1959）結尾，他對後輩的鄭重期待再度告知讀者，為何他的魯迅論遠不僅限於一種作家批評：

> 誰要是能把王國維的自殺、魯迅的靠攏、周作人的附逆寫進小說裏去，該是了不起的大事。……他們的學問，文章，「趣味」探索的精神，和對寫作的用心，我們恐怕卻還不能望其項背。他們的沒落，正如悲劇人物的沒落一般……他們的政治色彩不同，然其為不幸的「個人」則一。[72]

這不是他第一次建構作家序列。考慮到魯迅在夏濟安生命史中的不一般，引文或可這樣理解：以徵實的眼光看，魯迅身上發生的文學—政治悲劇亦見於王國維、周作人；三人在政治上取向完全不同，但正是一致的政治失敗使他們得以藉文論和小品文成就古典文學傳統的現代創造，意味著文學更具生命力，至於政治則不過一時之絢爛，至極後歸於沈寂。

72 夏濟安，〈祝辭〉，白先勇主編，《現文因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頁 14-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倘若運氣好些，夏濟安可以寫出完整的《魯迅傳》，[73]另一方面更全面、系統地呈現個人對文學和歷史的情志，想必能在現代文論史上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只可惜在留美的餘生中，自始至終的疏離感使他常常流露悲觀，[74]一定程度阻礙其落實相關研究計畫。1965 年 2 月 23 日，夏濟安在美國三藩市猝逝，享壽 49 歲。

## 三、小結：重審冷戰早期文學與政治的互動

通過再澄清夏濟安批評魯迅的意圖，其實還能這樣理解陳世驤的並置：同樣是借助西來的文化資源，標舉文學的自覺以體悟人的情性，夏濟安讀魯迅之書，知魯迅之人，論魯迅之世，也是詮釋冷戰早期的人之「文」和文之「道」，而與千年前，在文論中吸收並轉化佛學思想的劉勰有了相互對照的可能——說明在中西文論資源的地位極度失衡時，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文論家仍有足夠的智慧來感應本國悠久的傳統。

既往的印象相信，特別在冷戰早期的全球政、文、學體制面前，敵／我分明的立場高壓迫使一切文學家坐以待斃，這一時期也堪稱文學活動的「至暗時刻」，必須仰賴批判性思維，強調獨創、特異的文學批評及理論研究尤為如此。然而在「中國」和「世界」輾轉離散，文學與政治此起彼伏的背景下，夏濟安對魯迅的祛魅式批評，及其衍化出的新古典主義文論卻讓我們探聽到「執拗的低音」：新批評的美學理想一再堅持以文本為本位，從而拒絕討論外部因素對文學的影響；但受冷戰早期政治生態的壓力衝擊，鮮明的政治立場批判態度也在他身上屢屢反向破壞這種獨立性，強勢的背景文化和個人強硬的批判介入相互角力、斡旋而難分高下，反倒突顯夏氏主體性之可貴，引發論述的張力，令實際擔負的政治壓力、深受冷戰背景制約的立場批判等看似「為政治」的負面因素得以被有機轉化為批評的動能。夏濟安故得充分理由，把目光投向從前疏於關心的中國文學文化，反過來令批評得以融文學、歷史和政治於一爐並昇華至新古典主義文論，有足夠洞察力批判五四運動的政治—化現代性，結果彰明冷戰早期中國文論強韌激進的文學性。

從世界文學的尺度來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韋勒克（René Wellek，

73 「我這樣弄下來，寫 full-length 魯迅傳記也不是件難事。」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頁 103。

74 同上註，頁 2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03-1995）等人提出「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分野，深刻改變日後文學研究的面貌。然過去數十年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從業者未免太過誇大兩種取徑之間的差異、衝突，以致常常懶得注意、發掘及想像文學理論與社會歷史錯綜的可能：韋氏的二分法與夏濟安的魯迅論幾近同時出現；然而後者從對立到融合，「外」和「內」在大歷史的衝擊下竟能以這般詭異的方式交纏一起，溝通近代中西學問相互發明，堪稱創舉，可為什麼我們單單熟稔西人招式，卻對夏濟安的理論貢獻不置一詞？

文末筆者想提一下夏濟安 1961 年的自道。所謂「中國人犯不著軋在美國人淘裏爭閒氣」，「少討論中共，多研究古代中國」的界說想必足夠明示讀者，他在中年由研究英美文學轉向現代中國文學，絕非打算用文章來討好誰：

> 我們中國人犯不著軋在美國人淘裏去爭閒氣。你上次信上說，少討論中共，多研究古代中國，我是很贊成的。我們總會有我們的影響——讀我們的文章的人，和我們在友善的空氣下談話之人。[75]

此言不虛。夏濟安晚年的信出人意料地記載了不少有關古代中國文學的批評，再度證明在中共研究之外，他對中國文學文化有著更深層次的關懷。[76]

作為一位洞悉五六十年代區域研究「經世致用」庸趣的檻外人，身分的焦慮全因其人發自內心認同的仍是所謂「為己之學」。只不過彼時全球社會政治至上的壓迫氣流已不容許他安坐書齋，內心的苦悶和撕裂使其最終只能在私人書信中擠出幾行字來吐露心聲——他對清儒的觀點可作一證：「清儒因為沒有人逼著他們去研究，名利心較淡（他們如要名利，乾脆去做官好了。孔子所說：『古之學者為己』。），不忙著發表文章，他們的研究亦許比較紮實可靠。」[77]聯繫本文論題，其實這種認同很大程度源於作為學者的魯迅，或令兩人的關係更為深刻：魯迅表面鮮少論及清儒，然而暗地裏接續其「紮實可靠」的學術精神，[78]

75 同上註，頁 451。

76 關於這一話題，參見魏豔，〈新與舊：從書信集看夏氏兄弟的古典小說與通俗文學批評〉，王德威、季進、劉劍梅主編，《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香港：三聯書店，2020），頁 92-100。

77 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頁 98-99。

78 陳平原，〈清儒家法、文學感覺與世態人心——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想必夏濟安對此早有自己的想法。不然他也不會斷定魯迅「十分細心求學」，將之同「學問很博」的周作人（1885-1967）作一番耐心比較。[79]

夏濟安的悲劇一如魯迅的悲劇，深深植根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大動盪，同時又連結世界文學，以及人文學術的新形勢。縱使後世同領域學者的結論很快超越夏氏，後者在接觸魯迅過程中表現出的種種抉擇、掙扎，及其為了「在自己身上克服時代」而付出的沈重代價，實屬獨一無二的生命歷程——作為自由信念最重要的表徵，文學性正從這種時代悲劇中得到淬煉：魯迅身上最可貴的批判精神算是被夏濟安提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在冷戰早期意外以超越左右論述的姿態再現人間。

頁 331-335。

79 夏濟安對魯迅和周作人的文藝趣味有過一番詳細的比較，未能引起學界注意。從中不難看出，他對魯迅的學術表現也有過一定研究，見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頁 106-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引用書目

王洞主編，季進編註，《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47-195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0-19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5-195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59-196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1962-196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

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5 期，2017 年 7 月，頁 285-307。

———，〈五四之後：有聲的香港〉（2019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香港科技大學「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文字稿由網友整理，發表於「豆瓣」，〈https://www.douban.com/people/124764727/status/2493493268/〉，2019 年 5 月 11 日上網。

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王愛萍，《夏濟安論》，蘇州：蘇州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季進先生指導，2017。

古大勇，〈臺灣「戒嚴」時期和大陸「毛澤東時代」兩岸的「魯迅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 年第 11 期，頁 93-104。

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著，朱南度譯，〈傳統與個人才具〉，《文學雜誌》第 8 卷第 3 期，1960 年 5 月，頁 22-29。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王柏華、陶慶梅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2。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的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8。

余夏雲，〈現代性的政治——論夏濟安左翼文學研究的意義〉，《南京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1 期，頁 117-121。

李歐梵，〈光明與黑暗之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當代作家評論》2007 年第 2 期，頁 10-19。

李兆前，《影響的焦慮：T・S・艾略特和 R・威廉斯文化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宋明煒，〈夏氏兄弟與人文主義〉，《新民週刊》第 45 期，2005 年 11 月 11 日，頁 70-71。

長堀祐造著，王俊文譯，《魯迅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臺北：人間出版社，2015。

金理，〈從夏濟安的《香港——一九五零》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零》——一首詩與一篇小說的關聯閱讀〉，《上海文化》2010 年第 6 期，頁 43-49。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著，賞一卿等譯，《國家與自由：斯金納訪華講演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哈金，《湖臺夜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世驤，〈序〉，夏濟安，《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頁 1-10。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陳建忠，〈「區域研究」視野下的文學研究——冷戰時期夏濟安與夏志清的魯迅論〉，張鴻聲、朴宰雨主編，《世界魯迅與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頁 206-220。

孫連五，〈夏濟安的大學成績單〉，發表於澎湃上海書評，〈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159060〉，2020 年 9 月 14 日上網。

夏志清著，劉紹銘、李歐梵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夏濟安，《夏濟安選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萬芷均等譯，《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祝辭〉，白先勇主編，《現文因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頁 4-15。

———，陳通造譯，〈中國知識人的命運〉，發表於「豆瓣」，〈https://www.douban.com/note/704266207/〉，2018 年 7 月 8 日上網。

唐小兵，〈左翼知識人與中國革命——評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二十一世紀》第 164 期，2017 年 12 月，頁 141-149。

張鳳棲，〈我所知道的夏濟安〉，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主編，《永久的懷念》，臺北：夏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頁 31。

張健，〈文道、才性與心術——文心雕龍幾個理論命題及其在中國文論史上的地位〉，《學術研究》2009 年第 3 期，頁 122-127。

張德強，〈夏濟安文學批評方法淺析〉，《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7 年第 4 期，頁 32-34。

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指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6 年 2 月，頁 1-35。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第 1 卷第 1 期，1972 年 6 月，頁 108-116。

黃克武，〈蔣中正、陳誠與胡適：以「三連任」問題為中心（1956-1960）〉，黃克武主編，《1960 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頁 59-172。

黃維樑，《中國文學縱橫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雷震日記（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

葛兆光，《餘音：學術史隨筆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楊傑銘，《冷戰時期魯迅思想的臺、港傳播與演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許子東先生指導，2014。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蔡宗齊著，劉青海譯，《比較詩學結構：中西文論研究的三種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鍾書，《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簡明海，《五四意識在臺灣》，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薛化元、劉季倫先生指導，2009。

魏思齊（Zbigniew Wesolowski），〈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漢學研究通訊》第 26 卷第 2 期，2007 年 5 月，頁 30-40。

魏豔，〈新與舊：從書信集看夏氏兄弟的古典小說與通俗文學批評〉，王德威、季進、劉劍梅主編，《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香港：三聯書店，2020，頁 92-100。

Hsia, Tsi-an. “The Fat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ee China Review*, April 1951.

--- . “Nineteen Nineteen and After.” *Free China Review*, May 1951.

--- . “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ee China Review*, September 1951.

--- . “Demons in Paradise: The Chinese Images of Rus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49, no.1 (1963): 27-37.

Eliot, Thomas Sterns.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Wang, Xiaojue. *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 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and Politics Discourse in the Early Cold War Era: Revisiting Tsi-an Hsia's Monograph on Lu Hsün

Zhu, Yuan-si *

## Abstract

Anyone who pursues overseas Lu Hsün studies or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nnot afford to neglect the monograph on Lu Hsün during the Cold War by Tsi-an Hsia (1916-1965). But the humanistic values of his writings were never totally revealed because of his untimely death.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Letters Between Chih-tsing Hsia and Tsi-an Hsia (1947-1965)*, this article proposes firstly that Tsi-an Hsia also becam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tortuous realistic debates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t that time by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early Cold War. Secondly, it elaborates how the debates reflect Neoclassicism and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and its strong literariness.

**Keywords:** Tsi-an Hsia, the early Cold War Era, New Criticism, Lu Hsün Studie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 B.A.Student, College of Cultural Creativit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vladimirzhu1998@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